

华侨爱国的典范

叶 飞

早在 20 年代，我从海外归来在厦门求学和工作的时候，就仰慕陈嘉庚先生的大名。抗战中，我听说陈先生去过延安并已成为共产党的好朋友，对他敬重的心情更油然而生。1949 年，我奉命率部进军福建，解放福州、厦门。新中国诞生后，我才得到机会和嘉庚先生见面，和他经常交往，成为朋友了，一直到他的逝世。我对先生爱国爱乡的精神，一向是敬佩的。

陈嘉庚先生少年离乡到南洋谋生，那时的祖国遭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瓜分的威胁。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，陈嘉庚先生在海外艰难创业的时候，十分关注祖国的安危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他挺身而出，为国难奔走呼号，不计个人安危得失，他的高风亮节，赢得了海内外同胞的高度尊敬。毛泽东同志称赞他是“华侨旗帜，民族光辉”，周恩来同志写祝词赞扬他“为民族解放尽最大努力，为团结抗战受无限苦辛，讻言不能伤，威武不能屈，庆安全健在，再为民请命。”

陈嘉庚先生深明大义，立场鲜明。抗战胜利后，他致

电美国总统杜鲁门要求美国“不再援助蒋政府，以使中国内战得以终止，人民痛苦可以减少”。新中国建立前夕，他以 75 岁高龄毅然返回祖国，参加全国政协筹备会，投身新中国的建设事业。后来，他又以一个老同盟会会员的身份，呼吁海外国民党人士回到爱国的行列中来，共同推动祖国和平统一的事业。直到临终，他还念念不忘祖国统一，特地留下遗嘱，鼓励后人致力统一大业。

在追念陈嘉庚先生一生事业的时候，尤其值得纪念的是他对兴办教育，培育人才的贡献。陈嘉庚先生一生热心于捐资兴学，创办了厦门大学、集美学校和南洋的许多华文学校。即使在外国资本家的激烈倾轧使他陷于经济拮据的困境中，他对要他停止负担教育经费的银行的回答仍是：“我的经济事业可以牺牲。学校绝不能停办。”他办教育的捐款，累计起来几乎相当于他的全部财产。他以终生的艰苦经营，实践了自己“我毕生以诚信勤俭办教育公益，为社会服务”的信条。陈嘉庚先生重视知识和人才的这种远见卓识，今天看来，尤为可贵。

我们学习陈嘉庚就是要学习他的爱国之心，报国之行，发扬他艰苦奋斗，勤俭奉公的精神，为早日实现陈嘉庚先生毕生所效力和盼望的振兴中华、统一祖国的宏伟大业而努力奋斗。

陈嘉庚光辉的一生

张 楚 琨

华侨史上有一个光辉的名字，永远铭刻在千百万华侨的心里，受到祖国人民的尊敬和怀念。这名字贯串于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漫长岁月中，和“倾资兴学”连在一起，和“爱国爱乡”连在一起，和“诚毅”、“坚持正义”、“明辨是非”、“民族气节”连在一起。这便是毛主席誉为“华侨旗帜，民族光辉”的陈嘉庚。他“为中国人民革命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”。

(一)

陈嘉庚 1874 年 10 月 21 日生于福建省同安县集美社（现属厦门市）的一个华侨世家。曾祖父陈时赐兄弟五人中有两个出洋定居，当时称为“番客”。父亲纓杞（又名杞柏）远渡新加坡开了一家米店。大伯父纓节和二伯父纓酌也出过洋。

陈嘉庚生于国难，长于国难。在他诞生前 32 年（1842 年），清王朝在鸦片战争中打了败仗，订了城下之盟《南京

条约》，与集美一水之隔的厦门被迫成为“五口通商”的一个口岸，祖籍同安的总兵陈化成在这场战争中壮烈殉国。陈嘉庚诞生那年，日本借口琉球遇难船民事件，进犯与集美遥遥相望的台湾，清王朝又签订了一个屈辱的《中日北京专约》，承认琉球为日本属国。在陈嘉庚十一、二岁时，法国入侵福州，爆发马尾海战，“法国不胜而胜，中国不败而败”。陈嘉庚第一次出洋是 17 岁，正值日本大肆叫嚣“反华战争”；第二次出洋是 21 岁，屈辱的《马关条约》把台湾奉送给日本。在八国联军攻陷北京，祖国面临列强瓜分的危势下，他第三次回国，在集美和厦门住了 3 年，亲眼看到厦门怎样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城市，鼓浪屿怎样成了帝国主义的“公共租界”，英美商人在那里贩卖鸦片，设“卖人行”，运出“猪仔”，进行各种经济掠夺，日本浪人横行霸道，鼓浪屿也成了走私犯、土匪、买办、汉奸的安乐窝。

陈嘉庚的青少年时代就是在这样国难深重的环境下度过的。集美是个不大的半岛，三面环海，土地很少，当时共有 2000 多人，全部姓陈，主要以捕鱼和滩涂养殖为生，真是一穷二白。集美在历史上有过光荣的传统，反清抗荷的民族英雄郑成功在这里建立过基地，留下了“延平故垒”和“国姓井”的遗迹。陈嘉庚 9 岁入私塾读“三字经”、“四书”，识字不多；16 岁才对古文和报刊“有一知半解”，后来能够写文电、著书，完全靠自学。家乡文化落后私塾学生很少，女孩不得入学，十余岁儿童还光着屁股成群游戏，给他留下触目惊心的记忆，促使他日后下定办教

育改变家乡面貌的决心。

陈嘉庚的经济事业在 1904 年才初露锋芒，这以前的 13 年一直在他父亲经营的顺安米店服务。米店停业后，他集资 7000 多元（叻币，下同），创设菠萝罐头厂，号曰“新利川”不久又接管也是经营菠萝罐头厂的日新公司。两厂在 3 个月中获利近 4 万元，给他莫大鼓舞。

当时，橡胶第一次从巴西移植到马来亚，这位具有远大眼光的年轻实业家认为大有可为，购买 2000 元种子播种在菠萝园中。到 1925 年他已拥有橡胶园 15000 英亩，成为华侨中最大橡胶垦殖者之一。陈嘉庚看出工业的重要，开办、橡胶制品厂，生产胶鞋、轮胎和日用品。先后在国内各城市，南洋和各国大埠设立分销店 100 多处，直接代理商遍及五大洲。我国 20 年代到 30 年代的学生和市民很多都穿过钟标的陈嘉庚鞋。他还经营米厂、木材厂、冰糖厂、饼干厂、皮革厂等，厂房达 30 多处。他的资产在全盛时期的 1925 年达到 1200 万元（叻币，约值黄金百万两）。

陈嘉庚经营实业的 30 年，为侨居地繁荣做出了重大贡献。他最早引进橡胶，进而大面积种植，被称为新加坡马来亚橡胶王国的四大开拓者之一。他首创橡胶制品大规模生产，促进了侨居地民族工业的发展。他有计划有组织地开辟了橡胶制品和其他制品直接输出的国际市场，在华侨中第一个打破英国垄断资本的垄断局面。他培养成千成万的企业家和技术人才（著名的大实业家李光前、陈六使等都出自他的门下），造就了侨居地经济的接班人。

陈嘉庚经营制造业还有一个远大的目标，就是为祖国

民族工业训练人才。他说：“对制造厂不惜垫资扩充者，以 20 世纪为树胶之时代，日本小国尚有胶厂 400 多所，以我国之广大竟无一相当树胶厂。新加坡为产胶区域，政权虽属英国，所需男女工人概我华侨，化验制造各机器可臻完备，出品种类众多，可以训练职员工人，如师范学校之训练学生，将来回国可以发展胶业。”由此可见，祖国工业化和引进人才早就是他的夙愿，他的理想。

（二）

反对清王朝的革命浪潮冲击着南洋华侨社会。孙中山 1906 年 2 月来到新加坡，不久同盟会分会假晚晴园成立，新加坡成为革命党人在南洋活动的中心。邹容的《革命军》改名《图存篇》广为传播，革命党人创办的《中兴日报》与保皇党的《南洋总汇报》论战日趋激烈，孙中山亲自领导的这一批判改良主义的斗争，以“南洋小学生”为笔名连续发表《论惧革命召瓜分者乃不识时务者也》等文，风靡一时。陈嘉庚是《图存篇》与《中兴日报》的忠实读者，思想受到很大影响。经过林义顺介绍，认识了孙中山，亲聆其革命言论，极为钦佩，遂于 1910 年加入同盟会。辛亥革命胜利，福建光复，召开闽侨大会，他被推举为福建保安会会长，筹款 20 多万元（叻币）支援福建。另筹 5 万元支持孙中山。如同许多前一辈的爱国志士一样，陈嘉庚是在孙中山哺育下开始革命活动的。

数千年的专制统治一旦被推翻，爱国华侨的欢欣鼓舞

可以想见。陈嘉庚决心回乡办教育以报国，在《南侨回忆录》中他写道：“民国光复后，余热诚内向，思欲尽国民一份子之天职，愧无其他才能参加政务或公共事业，只有自量绵力，回到家乡集美社创办小学校。”1913年“乡立集美两等小学”诞生了。在陈嘉庚胞弟陈敬贤及弟媳王碧莲的协助下（学生称陈嘉庚为“校主”，称陈敬贤为“二校主”）陆续增办各种类型学校，到1927年计有：男小、女小、男师范、男中、女中、水产航海、商业、农林、幼稚师范、国学专门学校共10所学校，另设幼稚园、医院、图书馆、科学馆、教育推广部，统称集美学校。1923年孙中山大元帅大本营批准“承认集美为中国永久和平学村”，“集美学村”之名就此确定。规模这样宏大，体系这样完整的“学村”，全国找不到第二个！

五四运动宣告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。孙中山认为是“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”，“人皆激发天良，誓死为爱国之运动”。陈嘉庚看到了新的希望，以愚公移山的气概回国筹办厦门大学。筹办“通告”是一篇激动人心的爱国宣言：“民心不死，国脉尚存，以四万万之民族、决无甘居人下之理。今日不达，尚有子孙，如精卫之填海，愚公之移山，终有贯彻目的之一日。”认捐开办费100万元，常年费共300万元。这所华侨创办的惟一大学，也是全国惟一独资创办的大学，于1921年4月6日开学，陈嘉庚独力维持了16年。后来世界不景气严重打击华侨企业，陈嘉庚面对艰难境遇，态度仍很坚定地说：“宁可变卖大厦，也要支持厦大，”他把自己三座大厦卖了，作为

维持厦大经费。1937 年厦大改为国立，他十分沉痛：“不图经济竭蹶 为善不终 貽累政府 抱歉无穷！”实则留下了一座永为后人所纪念的丰碑！

陈嘉庚还以同样热诚发展侨居地的教育事业，在新加坡创办和赞助许多学校，其中有道南小学、爱同小学、崇福小学、南侨师范、新加坡水产航海学校和南洋华侨中学，后者是南洋第一所华侨中学。

从办学主张和办学实践看，陈嘉庚不但是一个教育实业家，而且不愧为一个卓越的教育家。他的教育思想概括为几点：第一，提倡女子教育，突破封建禁锢，开风气之先；第二，强调优待贫寒子弟，奖励师范生；第三，20 年代即提倡学生要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；第四，主张“没有好教师就没有好学校”，确立教师在学校的主导地位；第五，为了振兴实业，培养生产技术人才，倡办职业技术教育；第六，要求普及教育，订下同安“十年普及教育计划”，设立同安教育会和教育推广部。这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，以开拓者的姿态和革新者的精神，为教育事业奋斗一生，真正做到“诚毅”二字。

关于办学的动机与目的，陈嘉庚自己说得很清楚：“教育不振则实业不兴，国民之生计日绌。……吾国今处列强肘腋之下，成败存亡，千钧一发，自非急起力追，难逃天演之淘汰。鄙人所以奔走海外，茹苦含辛数十年，身家性命之利害得失，举不足撓吾念虑，独于兴学一事，不惜牺牲金钱竭殫心力而为之 唯日孜孜无敢逸豫者 正为此耳。”

又说：“复以平昔服膺社会主义，欲为公众服务，亦以办学

为宜。”有人批评他为“教育救国论”者，他对友好解释道：“民智不开，民心不齐，启迪民智，有助于革命，有助于救国，其理甚明。教育是千秋万代的事业，是提高国民文化水平的根本措施，不管什么时候都需要。”

陈嘉庚对捐资办公益的热心家勒碑留名，对自己却不居功、不务名。他为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建了多少高楼大厦，没有一所刻上他的名字或以他的名字命名。1923年集美学校师生和校友为了庆贺他的50寿辰和表彰他的兴学业绩，募捐筹建“介眉亭”。他拒绝了，认为“建亭祝寿是沽名钓誉”“决不接受”。

陈嘉庚可贵的民族气节，在不接受施舍式补助一事充分表现出来。战后，集美学校校舍遭日本狂轰滥炸损坏不堪，善后救济总署厦门分处拟予补助。他复函道：“国家不幸，遭抗战之损失，战事告终后，不能奋志自主，以图强盛，反而依靠外国救济，政府如是，社会如是，华侨机工复员亦如是，甚至教育机关亦如是，其可耻可悲、可羞可痛，为何如是耶！”

（三）

殖民地的民族资本同殖民者垄断资本的斗争十分激烈，华侨民族资本家备受帝国主义垄断资本集团的欺凌和压迫。当资本主义危机席卷全世界包括殖民地的时候，帝国主义垄断资本力图把危机转嫁给殖民地人民，对民族资本的压迫更为加重。陈嘉庚一扫民族资本家的软弱性和妥

协性，以硬骨头精神同垄断资本集团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。他写的《个人企业追记》，追述斗争的事迹，人们可以从中找到他为什么那么憎恶资本主义，痛恨帝国主义，希望有一个强大祖国的社会根源和经济根源；同时对他坚持办学，不惜牺牲身家财产的精神和行动表示钦佩。

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加深，陈嘉庚的经济事业从 1926 年起开始走下坡路。橡胶价格一落千丈，他属下规模最大的谦益胶厂第一次亏损 30 多万元，橡胶园、米店和黄梨厂均无利可图，这年汇给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的费用总数仍接近 100 万元。1928 年 5 月 3 日日军制造的济南惨案发生，陈嘉庚组织山东惨祸筹赈会，并发起抵制日货，致使橡胶制造厂被奸商放火烧毁，加上日货削价倾销，整个财产损失过半。两次卖出橡胶园 400 多万元，尚不敷支出，只好向外国银行举债 300 多万元。1929 年到 1931 年为世界经济大恐慌时期，橡胶从每担最高价二、三百元跌至最低价七、八元，陈嘉庚积存货品跌价不下百余万元；无收入而支出不减，又再举债 100 多万元。垄断资本集团利用债权人地位，强迫陈嘉庚改作股份有限公司，并提出停止维持两校经费的条件，陈嘉庚愤然说：“不，企业可以收盘，学校绝不能停办！”对方退了一步，议定两校经费每月限 5000 元。他任董事经理，参加股份的资产犹值 200 多万元。1932 年世界经济略呈转机，“似有否极泰来之象”，英银行团却不顾陈嘉庚的意见和劝告，硬要各地橡胶厂出租，并把设在国内一百多处和南洋各国的分行支行全部关闭。陈嘉庚为了两校经费打算，采取化整为零的打埋伏策略：将

巴双厂租与南益，南益出资，利息扣后，有利全数充厦集校费；麻坡厂租给益和，利息扣后，有利全数充两校校费；怡保、太平等厂则招诸经理人合租，他也参加一份，有利抽三成助校费；峇株厂租给宗兴公司，立约相同。这个策略得胜了，陈嘉庚战后汇回近千万元（人民币），扩建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就靠这些利源。各分厂出租以后，陈嘉庚把希望寄予制造胶鞋、胶靴、胶日用品的橡胶品制造厂。当时形势极为有利，1933年9月召开的加拿大经济会议，提高关税壁垒。新加坡是自由港，没有增税，世界各地纷纷来订货。陈嘉庚估计制造厂的胶鞋每月可得利12万元，一年后各业可以复兴，深自快慰。但是希望落空了，即垄断资本集团要求把所产胶鞋归他们一手专卖，陈嘉庚极力反对。英银行团说：“我们英国利权不容他人染指！”陈嘉庚股份有限公司终于在1934年底收盘结束。他经营的企业失败了，但是“倾家兴学”的美名传扬于海内外。没有悔意，没有气馁，1934年发表在《东方杂志》的自传，题目叫做《畏惧失败才是可耻》，足以表明他不屈的精神风貌。

经营实业数十年，同帝国主义垄断资本打了长期交道，特别是1929~1931年的世界经济大恐慌的袭击，使陈嘉庚从切身经验中认识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趋势。1933年4月26日刊载在《南洋商报》的《不景气之历史观与南洋华侨当前应采之策略》一文提出轰动一时的论点：“鄙见所及，欲救不景气之希望，只有两事，非战争则共产主义。战争属于治标，共产主义可以治本。然治标或可较易见的，惟非根本之解决，徒演人类之惨剧。至于治本，虽生效较迟，

然目的一达，则世界大同。平均工作，则工人既免失业。工作至多四小时，衣食无缺，老幼疾病，公共负责。既无私业之竞争，复免患得与患失，尧天舜日，真人类无穷之幸福也。”这一大胆猜测果真得到证实 过了 6 年，即 1939 年 9 月，希特勒侵入波兰，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“惨剧”。又 10 年，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，“尧天舜日”临近了。陈嘉庚晚年拥护党、拥护社会主义的热忱不是没有来由的。

（四）

陈嘉庚从事抗日救国活动，从 1923 年创办《南洋商报》鼓吹抵制日货起，就在华侨社会发生很大影响。1928 年组织“山东惨祸筹赈会”，担任会长，第一次把华侨抗日力量团结起来，培养和训练一批爱国筹赈的骨干分子。七七事变，全面抗战展开，他又被选为“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”（简称“南侨总会”）主席，华侨领袖地位从此确立。

1938 年成立的南侨总会是代表当时全南洋 800 万华侨抗日救国的统一组织，名义上称为“筹赈祖国难民”实则以财力、物力、人力支援祖国抗战。为适应当地环境，遵守当地法律，筹赈会采用了慈善性质的名义。陈嘉庚应菲律宾侨领李清泉，吧城侨领庄西言的要求和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的委托。10 月 10 日在新加坡召开南洋华侨筹赈祖国代表大会，到会代表有英属香港、马来亚、缅甸、北婆罗洲、荷属爪哇、苏门答腊、西婆罗洲、西里伯、美属

菲律宾、法属安南及暹罗各地区四十五埠 168 人，陈嘉庚被选为领导机关主席，他致词阐明召开大会的“第一义”说：“抗战严重期间，凡我侨胞自应精诚团结，集思广益，俾能加紧出钱出力，增强后方工作。”

南侨总会的成立标志着华侨爱国大团结的新阶段。南洋各属各埠的筹赈会加入南侨总会者达 80 多所，各属各埠的筹赈会又设分会千百所。参加筹赈会者有各帮（闽帮、粤帮、潮帮、客帮、琼帮、三江帮等），各行业（各种同业公会），各团体（工会、妇女会、同乡会、宗亲会、学生会、青年组织、文化组织等），选为领导成员者有侨领、社会名流、记者、教师和基层群众代表。有了这样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，加上德高望重的华侨领袖担任领导人，华侨筹赈救亡工作遂在全南洋范围内形成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，取得辉煌成就。

南侨总会募集巨款援助祖国抗战。以 1939 年而言，抗战军费为国币 18 亿元，华侨汇回祖国之款 11 亿元中捐款约占 10%。南侨总会抗战义捐约国币 5 亿元，主要依靠群众用各种方式劝募，有特别捐，常月捐，节日献金捐，货物助赈捐，纪念日劝捐，卖花卖物捐，游艺演剧球赛捐，舟车小贩助赈捐，迎神拜香演戏捐等等，是一点一滴积起来的群众血汗！陈嘉庚在重庆报告：“富侨虽多，所捐者亦属有限”，“而劳动界颇踊跃，虽辛苦所得工资，亦能按月捐出多少，故能集腋成裘。”

派遣机工回国服务，是华侨支援抗战的另一大事。当时沿海口岸都被日军占领，只有安南和滇缅路还能通行。由

于缺乏司机和修理技工，对外运输感到困难。国民党官办“西南运输公司”委托陈嘉庚代为招聘。南侨总会六号通告发出后，热情报名回国者达 3200 余人，出现了极为动人的父送子、妻送夫的场面，对于支援前线起了显著作用。终因行政腐败，管理太差，严重挫伤了这些爱国志士的热情和积极性，不断有投诉书寄回，甚至有逃回来的，使陈嘉庚寝食不安，日夕思考着：这是为什么？

陈嘉庚在南侨总会成立不久，向重庆国民党对敌妥协派打了最响亮的一枪，这便是震动中外的反对汪精卫对日主和的提案。在广州、武汉相继陷落的紧急情势下，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公然发表对日和平谈话，一时妥协气氛弥漫重庆，出现了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最大危险。陈嘉庚和汪精卫有旧，曾拟聘其为厦门大学校长，后不果，他这时不顾私谊，以南侨总会主席名义打了一封电报给汪，指出“和平绝不可能”；汪复电称“和平条件如无害于中国之独立生存，何必拒绝”。往还数电，眼见无可挽回，恰好重庆国民参政会开会，陈嘉庚以参政员身份向大会提出“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”的提案，会上一致通过。邹韬奋称这寥寥 11 个大字是“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！”汪逃往香港发表“艳电”，赞成日本首相近卫声明三原则，陈嘉庚致电蒋介石强烈要求“宣布其罪，通缉归案，以正国法，而定人心。”看到只开除汪贼国民党党籍，未宣布国法处分，又致电追究到底：“今日前方将士浴血挥戈，后方民众卧薪尝胆……而独容汪贼与其党羽逍遥法外，实南洋 800 万侨众所莫解！”接着南侨总会发出通知第二十号：“揭发国贼

汪精卫之罪恶，请侨胞毋为妖言所惑。”陈嘉庚就是这样敢怒、敢骂、敢斗争、敢除恶务尽，表现了他的民族气节。

1940年3月，陈嘉庚亲自率领南侨总会所组织的“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”（简称“南侨慰劳团”）回到祖国，这是他一生的大转折，思想认识出现了飞跃的变化。从1927年到1940年回重庆之前，他是坚决的“拥蒋派”，曾任“马来亚华侨购机寿蒋会”主席，接受蒋介石为表彰其兴学功绩而赠予的二等采玉章，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代表大会宣言称：“中国最高领袖，蒋委员长乃中国国内外四万万七千万同胞共同拥戴之惟一领袖”，“蒋委员长之意志，即中国全国国民之意志”，抗战义捐扫数汇交国民政府行政院。然而，他尊重事实，明辨是非，访问重庆与延安之后，醒悟过来了，分清谁是谁非，从而把民族的命运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身上。

访问延安是陈嘉庚政治生活的里程碑。不管蒋介石怎样捧他，拉拢他，随后又怎样干扰他和中共领导人接触，阻挠他前往陕北，都不能动摇他探索国共磨擦真相，劝说国共两党团结抗战的决心。在南侨总会秘书李铁民和侯西反的陪同下，陈嘉庚于1940年5月31日抵达延安，下榻于设在窑洞的招待所。

恰巧李铁民触车碰伤住院，陈嘉庚在延安过了毕生难忘的9天。在这期间，会见了毛泽东主席、朱德总司令，进行多次深入的交谈；参观女子大学和第四军校；与财政、公安、司法负责人（均福建籍）谈话；广泛接触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的校友和归侨男女青年；出席延安各界欢迎会和

欢送会；参观西塞县的铁工厂、印刷厂。根据所见所闻，断定“中国的希望在延安”，“毛主席是中华民族的大救星”。后来他在《南侨回忆录》弁言上写道：“耳闻目睹各事实，见其勤劳诚朴，忠勇奉公，务以利民福国为前提，并实行民主化，在收复区诸乡村推广实施，与民众辛苦协作，同仇敌忾，奠胜利维新之基础。余观感之余，衷心无限兴奋，梦寐以求，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。”

怀着“喜慰莫可言喻，如拨云雾而见青天”的心情，陈嘉庚决定凭良心和人格说话，不待到南洋，出了延安界，如有人问，一定据实报告。6月24日在重庆应国民外交协会的邀请，他演讲《西北的观感》，介绍了在延安所见所闻：“那里自抗战以后，土地革命已经停止了，一切抗日的人都很自由。民众生活也很好，不痛苦，说到教育，也很好……他们进行了大规模的开荒运动，一年之内开垦了百多万亩田地，这些都是事实。”在国民党控制下的“陪都”，一个无党派的爱国人士讲了这样坦率的老实话和公道话，当然使大后方人民耳目一新，受到极大鼓舞。国民党反动派非常不满，叫侯西反出来扮演说客（侯早些时候已被拉到三青团中央当小头头），陈嘉庚对这个有数十年交谊的旧友说：“你和我同行，我哪句话不是事实？共党果有良好政治，外间毁誉算不了什么！贵党应该实行良好政治与之竞赛才对！我绝不能昧良指鹿为马！”蒋介石亲自出马了，一见面就“面红气盛，声色俱厉”，大骂“抗战要望胜利，必须先消灭共产党”。第二天，又请陈嘉庚吃午饭，要求陈嘉庚谈谈“对国民党有何感想？”陈嘉庚不畏强暴，把海外国民党

员的丑行照实说了。其威武不能屈也如此！

陈嘉庚继续视察，历经云南、贵州、广西、湖南、江西、浙江进入福建，回到阔别 19 年的家乡集美，到处都可以看到国民党当局“上下贪污，猫鼠同眠，误民弊政，无所忌憚”的现象，尤其使他痛心、愤慨不已的是福建省当局苛政祸闽的大量罪行，他要求各地同乡“万万不可坐视不救，袖手旁观！”原集美学校校长叶渊这时任广西省关税局长，劝陈嘉庚说“这里官员对国民党有很深的印象，凡不利于国民党的话，请注意别说。”陈嘉庚回答：“他们不问，我一定不说；若问，我必须表白是非，不能谄谀敷衍，应酬了事！”

陈嘉庚从仰光，经马来亚回到新加坡。一路上受到侨胞空前热烈的欢迎。他揭露国民党政府贪污腐化，假抗日真反共的本质，称颂中国共产党、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及其英勇抗敌的功绩，断言：“国民党必败，共产党必胜。”国民党派吴铁城专程到新加坡、马来亚搞“倒陈”活动，用尽一切鬼蜮手段，不能动陈嘉庚一根毫毛，其破坏团结，制造分裂的阴谋始终未能得逞。陈嘉庚在第二届南侨大会仍当选为南侨总会主席。大会《宣言》对陈嘉庚的评价是：“公忠谋国，一生如一日。”识足以辨奸，才足以服众，德望足为群伦矜式。”大会认为“抗战期间，南洋华侨不能无筹赈总会之组织，则不能无陈主席之领导。”

陈嘉庚为民请命，领导一个斗争又一个斗争，继南侨大会之后召开南洋闽侨大会，揭露国民党闽省当局种种祸闽暴政，要求采取行动解闽民于倒悬。大会选举陈嘉庚为